

对社区矫正假释犯对象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排斥问题研究

金碧华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社区矫正假释犯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在司法改革背景下而产生的特殊群体。从调查中发现,这类特殊群体在回归社会以后面临着来自体制内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双重社会排斥。由于社会化进程的中断,长期监禁生活使得他们很难适应社会变迁的现实,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上步履艰难。“罪犯也是人,应该享有人的尊严”。正视社区矫正过程中假释犯对象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社会排斥事实,并寻求社会融合、社会宽容的积极举措,将是今后国家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必须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社区矫正; 假释犯对象; 劳动力市场; 社会排斥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假释犯对象是指已经在监狱内执行部分刑罚(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剩余刑期在社区执行的“罪犯”。随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假释犯对象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目前试点工作对这类对象进行教育改造的现实情况看,他们是权利状况“特殊”的社会群体。假释犯对象回归社会的事实,正如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片断中所蕴涵的意义一样,他们是一群“体制化”的人,既是“体制内”的人,也是“体制外”的人。“体制内”意味着假释犯对象仍然受到国家公权力的强制干涉,而且这种强制干涉伴随着一系列的规范、训诫。假释犯对象必须遵守这些规范、训诫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体制外”则使假释犯对象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在正常情况下(解矫后)他们与普通人无异。他们同样受到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同样感受到变化无端的生活世界的震撼。事实上,由于长期与社会隔绝,假释犯对象这种双重角色的扮演使得其在回归社会以后必然面临来自生活各个领域的冲击,包括身份、户籍、住房、工作、医疗保障、收入、家庭生活、亲情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等方

面。其中,社会对于他们的排斥则是最沉重的现实,尤其是再就业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排斥是这类特殊群体始终无法逾越的一道坎。假释犯对象再社会化进程中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能否顺利达到预期目标而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因此,笔者力图从劳动力市场这个视角来讨论社区矫正进程中假释犯对象面临的社会排斥问题以及其具体的运作过程,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方面。当然,讨论的重点还是从假释犯对象现实遇到的各种有别于普通人的遭遇出发,以此来探悉这种来自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排斥的运作规律。笔者在 2006 年 3 月至 2007 年 5 月期间,通过深入访谈调查了上海市 D、C、T 3 个街道的 25 位假释犯对象,其中男性假释犯对象有 23 位,女性有 2 位。假释犯对象年龄主要在 21~74 岁,16 位已婚,1 位离异,8 位未婚。这些对象的刑期长短不一,刑期在 10 年以上的共有 11 位,刑期在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不包括 10 年)的有 14 位。假释犯对象的案由主要有:贪污、受贿、抢劫、强奸、贩卖毒品、虚开增值税发票、侵占挪用资金、商业贿赂、诈骗、挪用公款等。案发

前工作情况主要有:工人2位、下岗工人1位、公务员5位、个体户3位、公司雇员5位以及退休1位等。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证假释犯对象的个人隐私,他们的姓名都用英文字母大写指代,即姓和名拼音的第一个大写英文字母组合而成。

1 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的理论基础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排斥主要指“不同的事物对应有差异的人”;或者指,个人和群体的生活方式是否受社会结构的压力所致,它被用来强调和鉴定由于社会基础性变迁和社会的迅速瓦解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排斥是一种跨越多种范畴的、累积的、顺序的网络化过程,从多种职能体系中被排斥出来^[1]。根据李斌在《社会排斥与中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一文中的介绍,社会排斥可以定义为某种“不幸”的人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排斥,而且在社会保障领域里也受到排斥。

从社会排斥的表象上来进行界定,社会排斥理论的实质是研究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系统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并且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累积和传递^[2]。在这里,劳动力市场指劳动力供求双方彼此平等洽商和达成协议的地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中转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配置劳动力资源,但是劳动力的市场交换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而是充满着各种社会因素,即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受到社会现实限定的现象^[3]。在劳动力市场交换过程中,由于在政策制定、制度安排、社会歧视以及劳动者自身生理心理能力等各方面存在诸多障碍,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劳动力顺利实现市场交换,其中,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排斥作用影响最大。事实上,卡斯特尔早就提出了被排斥于劳动力市场之外只是多样社会排斥的其中一个,但是它通常被视为社会排斥的主要指标,尤其是在社会政策的讨论议题之中^[4]。

需要注意的是,笔者关注的假释犯对象回归社会后面面临的社会障碍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因此,从“过程”中理解这类特殊群体的实际遭遇,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这个动态过程主要归咎于体制内因素和体制外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有宏观的结构性安排,也有微观的主体性效果。当然,在劳动力市场中罪犯面临的社会排斥主要是指他们在求职过程中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就业范围狭隘、就业歧视,并且罪犯在就业结构中的地位明显低于普通人。

这些都是罪犯在劳动力市场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

2 社区矫正假释犯对象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的社会排斥

在被调查的25位假释犯对象中,假释出狱后再就业的有14位,就业方向有公司雇员、个体户、清洁工、娱乐场所等,就业过程中获得了来自朋友或者街道、社区矫正社工点的帮助和支持;还有11位对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再就业,除3位假释犯对象(YWF、WWR、HYQ)由于身体、年龄以及心理方面的原因选择在家外,其余7位假释犯对象都因为劳动力市场交换过程中设置的诸多障碍而无法实现再就业(对象LD父母让其呆在家里)。当然,即使在实现再就业的14位假释犯对象,通过访谈,他们也大多吐露出各自在找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社会排斥现象。

2.1 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排斥

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排斥主要针对的是入狱前曾经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包括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被判刑后原单位与之解除劳动合同,和入狱前没有进入过这些单位假释后希望进入这些单位就业的情况。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排斥对假释犯对象的影响主要是将假释犯对象彻底地隔离于上述这些单位,并在短期或长期内对他们的劳动就业形成不利局面。在调查对象中,入狱前有工作单位的假释犯对象有14位,入狱后这些单位都与之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并停止了各种社会保障项目的实施。假释后这14位对象都没能进入原单位就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合同关系早已解除。此外,其他11位假释犯对象“想都没有想过进这些地方”(对象语)——大多数假释犯对象都比较理性地看到了目前就业的形势——靠政府或原单位给自己“安排”或“安置”一个“稳定的工作”的想法毫无疑问已经“过时”或者说是非常幼稚的。大多数假释犯对象都对实现体制内的再就业失去信心,实际上,他们中除个别选择在家安度晚年外,大多无可奈何地选择“逼迫”自己适应当前的游戏规则,去寻找“非正规就业”的工作岗位或自谋职业。这里所说的“非正规就业”,主要是指雇主与雇员不签劳动协议或不签正式的劳动协议,雇主不负责雇员的社会保障缴费的就业方式。

笔者认为,目前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对于假释犯对象的社会排斥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第一,法律性排斥对于假释犯对象实现再就业

的影响。所谓法律性排斥是指国家颁布的法律规范设置了诸多内容,在时间、空间等方面将假释犯对象拒斥于劳动力市场,以此体现法律规范的惩罚性和教育改造倾向。从目前我国一些法律对监外罪犯的规定中可以看出,监外罪犯如果要想与正常人一样实现劳动权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一过程受到了用人单位自主权的排斥和社会上就业的歧视,而这些排斥的产生很大程度是依据于这些具有强烈社会排斥的法律规制。如《刑法》第39条规定,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未经司法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权利;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司法机关批准。即对管制分子有劳动权的规定,也有对管制分子一定程度限制择业自主权的规定;《刑法》第54条禁止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和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如《公司法》第57条条件规定: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生活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徒刑的,执行期满未愈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愈五年;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如《安全法》第81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到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到处分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如《劳动法》第25条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以上法律法规对狱外罪犯的劳动权的调整,既有限制、也有保障,实践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看,零散而不完整;限制性多而授权性少;限制条款立法多高层次,授权条款立法层次相对较低,其中显然还有些重大遗漏和法律冲突。曾经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工作过的假释犯对象,在被判刑后原单位全部与之解除工作合同关系,按照规定,这些对象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再进入这些单位任职。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在法律规范上的限制和用人单位“减少麻烦”的思想存在,假释犯对象再次进入这些单位的几率几乎为零,例如对象WMQ、CDW。

第二,政策性排斥对于假释犯对象实现再就业的影响。所谓政策性排斥是指国家、地方实施的政策内容带有诸多限制就业的内容,使得假释犯对象在劳动力市场交换中处于不利的位置。目前有关假释犯对象再就业的政策大多侧重于鼓励他们在社区服务业的岗位就业,特别是在政府开发的面向社区

居民生活服务、企事业单位后勤保障和社区公共管理的就业岗位以及清洁、绿化、公共设施养护等公益性岗位上实现就业。当然,有关政策在鼓励假释犯对象再就业的同时,也为他们设置了一些就业障碍,例如,处于失业的假释犯对象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后无正当理由2次不服从介绍就业或2次不参加再就业培训的,取消失业保险待遇。虽然从表面看大多数没有工作的假释犯对象都可能从这些政策中受惠,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这些假释犯对象被排斥于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之外。此外,政策对于就业的倾向性使得假释犯对象很难超出规定设置的范围,也就是说,除非假释犯对象社会关系很广,家庭经济情况较好,一般来说,那些个人生理、心理条件、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社会关系有限的假释犯对象大多只能被动地接受再就业服务中心或者社区的推荐,而很少有可能获得工作环境相对较好的岗位。

2.2 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排斥

体制外劳动力市场排斥主要针对的是完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劳动力市场在接受假释犯对象过程中设置的一些障碍,这些障碍使得假释犯对象在受到法律性、政策性排斥的同时还必须承受更为严重的社会化压力^[5]。体制外劳动力市场排斥对假释犯对象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制定一些标准化指标,例如年龄、技术、身份等,将假释犯对象排斥于劳动服务行业。在笔者的调查中,除个别假释犯对象选择再就业(对象YWF在家里炒股、WMQ买了辆车跑运输、QML从事服装生意、WCD、SAG自己创立了公司)外,大多数假释犯对象都考虑过或者实际找过工作(目前就业的有10人,3人选择在家安度晚年,还有7人处于失业状态),但是由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设置的诸多障碍,就业情况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2.2.1 年龄与社会排斥

年龄对于假释犯对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不大可能再在体制内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而目前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又供过于求,年龄相对较轻的劳动力比比皆是,加上用人单位大多喜欢招聘年纪20出头的年轻人,使得假释犯对象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经常被拒。实际上,从政府部门、社区矫正机关“鼓励假释犯对象在社区服务业的岗位就业,特别是在政府开发的面向社区居民生活服务、企事业单位后勤保障和社区公共管理的就业岗位以及清洁、绿化、公共设施养护等公益性岗位上实现就业”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调查中假释犯对象主要介于40~74

岁之间,40岁以下的只有5人,因此,可以看出假释犯对象年龄偏大者居多(实际上大多数假释犯对象都是“40~50部队”,就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被称为“老三届”或“老五届”的那一代人)。从访谈中了解到,部分年龄较大的假释犯对象在求职过程中都因为年龄问题而被招聘单位拒绝(当然身份问题也是一个主要因素)。此外,需要关注的是,由于对劳动力市场有关年龄问题的限制,个别假释犯对象从假释开始就放弃了寻找工作的念头,转而呆在家里安度晚年,如WWR、HYQ。

2.2.2 技术和社会排斥

现代社会普遍认为有一门技术对于一个社会人来说绝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技术创造财富,技术能够使人从贫困走向富裕。由于在专业上没有过硬的技术,或者在求职过程中没有一技之长,很多假释犯对象被拒斥于劳动力市场之外。事实上,由于假释犯对象大多在监狱里面呆的时间较长,即使具备一些专业技术,但是,由于技术更新速度较快,加之技术队伍目前供大于求,假释犯对象要想在劳动力市场上求得一个位置非常艰难。从访谈中了解到,18位寻找过工作的假释犯对象按照职业划分,管理人员有4位,公司一般雇员2位,工人2位,个体户2位,无业人员8位。从就业情况看,目前实现再就业的10位假释犯对象大多可以从事以前的专业,不过这些对象基本上是通过自己的关系如亲戚、朋友等找到的,而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途径。因此,这也可以反映出目前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规律。当然,不可以将一切责任和后果推给这些假释犯对象。虽然作为罪犯他们有责任承担犯罪的后果,但是,因社会改革和发展而导致的综合性病症,包括就业过程中的社会排斥,也应该理性地面对和反思。

2.2.3 身份与社会排除

可以说,身份排斥是困扰假释犯对象的最大问题,它的存在影响到假释犯对象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兵役法》第16条规定:“应征公民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或者被判处徒刑、拘役、管制正在服刑的,不征集。”《教师法》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另外《律师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公司法》等法对有前科的人从事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均有不

同的相应规定。因为前科的存在,假释犯对象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尤其是在求职方面遭受到诸多的刁难,无法享受到一般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虽然在理论上和法律明文规定假释犯对象应当作为一名正常的公民与其他人平等地享有一样的权利与机会,然而实际上由于我国“政审制度”的存在、刑法100条关于前科报告制度的存在,而前科在我国又没有相应可以或可能归于消灭的规定,任何假释犯对象只要有犯过罪的记录,就将如影随从地伴其一生。同时,由于对假释犯对象“贴标签”式的影响,即使这些假释犯对象在出狱后个人非常努力与优秀,他们在求职过程中仍然会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事实上,假释犯对象带着档案中的污点进入社会本身就有着耻辱感,而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屡屡因为前科问题被拒绝于工作之外,就意味着他们生活中某些权益将丧失、资格被剥夺以及社会评价降低。这些因为前科报告制度的存在而极有可能导致假释犯对象彻底扭曲重新做人的心理,进而将会把监所改造的成果毁于一旦,再次走向犯罪的深渊。假释犯对象MD重新犯罪的原因很大部分是因为无法解决身份上的排斥而实现再社会化,而在寻找工作的其他假释犯对象中,大多数都遇到过身份排斥。

2.2.4 自我排斥

在受到来自劳动力市场上用人单位排斥的同时,作为劳动力市场组成部分的假释犯对象往往会作茧自缚、“画地为牢”,通过限定就业地区与行业将自己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通过访谈,调查中多数假释犯对象倾向于在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从事工作;在就业地区上,生与斯长于斯的传统观念始终是他们就业的指导,很少有人愿意离开上海甚至是离家很远(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陌生人的社会更加可怕,当然法律的规定也限制了他们的流动)。虽然访谈中很多假释犯对象抱怨自己并没有挑剔什么工作,但就其选择就业的空间来看还是很窄。这实际上是硬生生地把自己排除在广大的劳动力市场之外。另外,比较奇怪的是,相对于男性假释犯对象而言,女性假释犯对象的自我排斥程度并没有因为性别的差异而更甚于男性。考虑到各种因素,女性假释犯对象在职业选择上更容易接受社会的安排,对于条件考虑不多。

3 结 语

假释犯对象再就业过程中存在的劳动力市场排斥使得多数假释犯对象或多或少体味到回归社会以

后的艰辛,现实的压力又迫使部分假释犯对象必须直面这种冲击,继续寻找赖以生存的工作。另一方面,再就业中屡遭挫折的经历反过来成为假释犯对象继续求职就业时的结构性条件,引起恶性循环。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现实生活中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排斥不仅给假释犯对象个人带来巨大打击,自信心失衡,而且引发了社会的不安定、不稳定。因为在整个社会中,仍然是“罪犯”的假释犯对象处于社会的最隐性阶层(假释犯对象回归社会后隐没于市民生活中,面临着法律性剥权和社会性失权的事实)。从调查中发现,这类群体在经历长期的封闭性监禁,在回归社会以后已经逐渐显示出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承受力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的特征。他们在进入社会(社区)之后一旦无法满足各方的需要(就业需求),就可能爆发各种危机,而社会风险也最有可能在这类群体身上出现,例如某些假释犯对象的上访事件。实际上,部分假释犯对象在回归社会之后由于忍受不了社会对他们的强烈冲击,而又重新犯罪,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隐患。中国正处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时期,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对于重新回到社会的假释犯对象来说,这些变迁无异于给他们再次就业拷上了枷锁,使得他们对前途和生活愈发迷茫。因此,必须采取社会融合策略,消除劳动力市场排斥,促进假释犯对象的再就业。由于假释犯对象自身的特殊情况(事实上仍然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以及我国在对待假释犯对象上特殊的教育管理措施,要想根本上消除假释犯对象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的社会排斥需要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需要外部结构性条件的改变以及假释犯对象自身主动的努力^[6]。

法律、政策的明确化是前提条件。必须明确社区矫正假释犯对象的法律地位,依法保障社区矫正假释犯对象的合法权利,必须将假释犯对象视为具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人而非被动消极的接受改造和矫正的客体,并尽可能少地限制假释犯对象的人身自由,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合法地位,才

能证明假释犯对象社区矫正的合法性。其次,必须明确社区矫正假释犯对象的社会保障制度。社区矫正假释犯对象也是人,在强制性再社会化进程中也应得到社会的尊重。目前的社区矫正制度是以司法矫正为主,生活救助和扶持为辅的模式。这是导致假释犯对象出狱后再就业不顺利、生活不确定和对未来丧失信心、产生恐惧的外部原因之一,也是基层矫正机构工作困难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需要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方面对假释犯对象这类特殊的人群进行不同的规定。再次,更新观念,消除歧视。实际上,社区矫正假释犯对象回归社会后面临的最大阻碍就是歧视,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这种内发的歧视一直是各种社会排斥问题产生的源头。因此,加大对社区矫正假释犯对象回归社会以后正面新闻的报道,加大对假释犯对象帮助和保护的宣传,让社会多关注这类群体,多了解他们的生活,并给与各种有利的支持。最后,建立不同层次的社会支持体系。除了劳动力市场方面得到理解和支持外,假释犯对象需要的支持是多方面的,而且在各方面得到的支持的数量和质量是不一样的。一方面,期待政府通过行政性手段正视假释犯对象的帮助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助假释犯对象,大力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互助等事业,鼓励社会帮扶活动,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

参考文献:

- [1] 张静敏. 在夹缝中生存: 被社会排斥的城市流动知青[J].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06(1): 110-112.
- [2] 唐均.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 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J]. 江苏社会科学, 2002(3): 41-42.
- [3] 朱国宏. 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4] 齐格蒙·鲍曼.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 [5] 石彤.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排斥: 以国企下岗失业女工为视角[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6] 金碧华. 社区矫正假释犯对象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排斥问题研究[J]. 社会科学, 2009(5): 82-83.

On the Social Exclusion of Parolee’s Lab Market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JIN Bi-hua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Parolees form a special group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during the time of Chinese judicial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parolees face dual social exclusion upon returning to society, includ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lab market system. Parolees have difficulties adapting to social change after long-term imprisonment and obtaining equal treatment in the lab market because of the interruption in socialization. “Criminals are also human beings who should enjoy the dignity of people.” The country,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have to take positive measures to seek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tolerance to solve this problem faced by parolees.

Key words: community correction; parolee; lab market; social exclusion

(责任编辑: 马春晓)

(上接第 744 页)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irectional Verb and the Directional
Phrase According to the locative Object

SHAN Bao-shun

(School of Culture and Media,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grammar rule for the directional verb has some unexclusive flaws and discrepanc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directional verb and the directional phras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cative object. We can define the extens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directional verb and the directional phrase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has two different types. According to the locative object, we can deter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mantic types and locative property.

Key words: directional verb; locative object; directional phrase

(责任编辑: 马春晓)